

■蜜蜂寓言

# 经济链·辐射力·贫与富

◎苏小和  
财经作家，现居北京

到过江苏、浙江等地的人，想必会被他们的富庶吸引，仔细分析，又能发现两地的不同。苏南似乎更具有整体意义上的富裕，布局方面显得理性、有度，一看就是当地政府有意为之的结果。而浙江的经济形态显然要零乱一些，感觉上企业的分布，民众的生活基本上靠企业和民众自发选择，政府并没有在相对宏大的层面来引导企业和民众具体的市场行为。

我们可以用链条的形态来勾画一下两地的经济特征：

苏南：政府—&gt;企业—&gt;个人

温州：个人—&gt;企业—&gt;政府

这种看起来基本相反的经济发生链所产生的效果截然不同。在苏南链条下，经济发展最大的驱动是政府，最大的收益者也是政府；在这样的强势政府背景下，企

业必然选择以依赖政府为主要的生存方式。这便是上个世纪90年代苏南模式的由来。现在看来，这样以政府主导企业的经济态势，并没有得到有效转变，政府的行为延伸到了企业的具体生存手段，而企业也必然以建立稳定的官商关系为主要任务。一个基本的结构是，只要官商关系成为企业的主要驱动力，必然导致企业的产权不清晰，民众的收益不稳定。今天的苏南，政府看上去财大气粗，各种形象工程生机勃勃，官员的升迁因此平步青云，但处在最底层的普通百姓，并不富裕。部分地方，甚至出现贫困村落，一个向度的贫富差距由此形成。

看看温州。这里的经济驱动力主要在个人，由于个人对市场的判断，引发出更多的个人市场行为，

其中包括企业行为。大量的企业在温州繁衍，把温州的经济总量做大，从而引起温州政府的相对强势。在温州，没有乡镇企业、国有企业这样的概念，全国各大城市都被垄断的出租车行业在温州彻底成为个人汽车出租户，温州人也不仅仅局限在温州本地，人们说，只要有人的地方，就有温州生意人的影子。因此，温州的富裕链条是，温州人最富裕，企业因为温州人的富裕而强大，最后才是政府的富裕。

这样的分析非常有意味。我们把视野放宽，再来看看上海和江苏（主要指苏南地区）、浙江两地的经济关系，然后再来看看北京和河北、天津两地的经济关系，同样能够发现政府的微妙作用。

上海—&gt;苏南(浙江)

把上海列在江苏和浙江的前面，是考虑到上海作为长江流域最大经济中心对周边地区的辐射作用。在行政区划的层面，上海与江苏、浙江是平行的，正是这种平行的制度设计，才让上海对周边地区

的拉动作用得以显现，这种偶然的制度因素，导致了上海的周边地区因为上海的发展而发展，今天江苏和浙江地区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与上海的发展大有因果关系。这正是上海的附加值之所在。

但是北京地区不同，她的经济链表现为一个棱角分明的四方形地带，带有巨大的集中意义和吸纳意义。一方面，北京的经济意义没有向周边地区辐射的价值，或者说在制度设计上，北京经济先人为主地保持着某种巨大的领导地位。所谓首善之地，周边地区只有为北京多贡献的任务。因此，今天的北京，就像金庸笔下的吸星大法，把周边地区的资源、财富毫不留情地吸纳进去，地理上越是距离北京近的地方，被吸纳的程度越强烈，这便是经济学上著名的“环北京地区贫困带”的由来。即使同样为直辖市的天津市，这些年来经济发展缓慢，与地理位置距离北京太近便是主要原因，历史上著名的天津卫就不得不为北京的发展牺牲自己。

事实上，我们解释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基于的是一个简单的常识：小政府、大社会。斯密早就说过，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仅仅是守夜人。问题是，我们今天的经济形态被界定为“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在许多方面实际上仍然是政府主导的投资经济、规模经济，这样的经济形态必然需要政府的行政之手。正因为如此，整个国家看起来是一个从大到小的经济链：

国家—政府—>地方(政府)  
—>企业—>个人

国家看起来富裕、强大，但地方政府却难以继，不得不与中央政府进行利益博弈。所有企业依附于政府权力，腐败大量出现，处在最末端的个人，毫无疑问成为绝对的弱势群体。一个环节构成一个利益集团，距离政府最近的人，获取财富的可能性越大，距离政府越远的人，必然跌入赤贫状态。一个社会的贫富差别由此形成，并不断拉大，并最终影响到社会稳定。

■买房者说

## 租房论实在经不起推敲

◎章剑锋  
厦门大学不动产金融研究中心研究员  
香港财经文摘杂志高级记者，专栏作者

风雨之后见阳光——人们对此总是深信不疑，却从来不去问问，风雨之后一定会有阳光，有过彩虹一定预示天晴吗？值得怀疑的显然远非于此。那种将租房理所当然地认作是阳光出现之前的第一道彩虹，念念不忘租房可以让人躲避高房价的风吹雨打、相信租房之后必然可以买得起房子的思维，实在不经推敲。

让一个人考虑租住十年房，之后再去买房，这是令人困惑的号召。十年前租房居住的人，十年后凭什么就能轻松地买到房子？

租房之后未必就能买得起房，这几乎可以肯定。“租”和“买”之间，本不存在某种承前启后的天然承合关系，倘若要将“先租后买”做硬性拼凑，必是某种侥幸预期作祟。主张这一立论的人，既不能给出更为详尽的解决方案，也将自身的聪明才智做了一回无谓赌注。由于有意无意忽略一些至关重要的“不确定性”因素。

需要考虑，十年以后居民的工资收入是否在增长？增长幅度能否超过房价升幅？如果届时租房户的工资收入没有明显增长，或者增幅大大低于房价涨幅，则“先租后买”的美丽梦想，是不是要立即将泡汤？

不要试图回避这一现实。居民营收收入正长期维持缓慢增长态势。不仅是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要慢于GDP的增长，而且就全体国民的收入水平来看，由于地域、职业、群体、单位等因素不一，也存在严重的区域性、群体性等收入分配差异。一部分人平均每年可以获得超过两位数的收入增幅，另一部分人则可能好几年只有两位数以下的增幅，还有一大部分则在原地踏步。

以目前的物价水平，工资的年增长率再快，也不可能超过房价逐月累计的增速。选择租房的人们，又无一不是收入有限、支付不足、职业不稳的群体，在固有的薪资增长环境不变的情况下，怎么能改租为购呢？那些一天到晚总是撺掇别人去租房住的有产者，莫非当真不清楚这回事儿吗？

工资收入之外，人们还会考虑，在这十年之间，城市房价是否不会出现某种剧烈变化，或者有朝一日还有可能忽然掉头向下，从而使租房户们能如期购房？

此类想法太天真。真好比街头混混在大马路上守候行人自车内往外扔钱包一样，幻想着发一笔意外横财。守株待兔的概率，大约可以等到一次兔子，也可能捡到一、两次钱包，却断不可能等到一套房子。

中国经济的长期性高走势以及楼价的持续性上涨，短期内似乎找不到回落的可能性。意外不

发生，市场不动荡，天意难改，格局已定。假若对这些一概可以视而不见，那么还应该知道，现实市场的客观性供需失衡，加之受多种人为因素影响的主观性供需失衡，这一状况长久不改，房价怎么可能掉头向下？又怎么可能维持在一个固定层面，不大步快跑？

就算不是大步快跑，只要维持当前小步向前的速度，就已经让人难以承受。鼓吹租房者，若对房价在未来十年间必定要跌落或不再上涨的走向没有把握，又如何能够保证“先租后买”呢？

在迟迟不肯做出此类承诺的同时，在下还要问一问：在今后十年里，持有租房论调的人是否还能保证房屋贷款的门槛和相关买房负担不会逐年提高？2003年至今，央行已连续加息11次，仅本年度就加了不下9次。住房按揭贷款的首付比例由20%一刀切，提高到了30%，本年度又开始将第二套房贷首付提高到40%，也是要一刀切的。其他的各项税、费又都在不同程度、以不同方式增加和变化着，这无不影响着购房者的切身利益，导致购房负担一再堆积。

今后十年间，这种状况会不会进一步持续？租房居住的人们，会不会因为购买一套房屋而付出比十年前更大的代价、面临更大的套牢风险？假如届时这一状况变得更加糟糕，租房户们又该怎么办？谁去为租房房的破灭承担责任？

呼吁人们先租后买，又不给出任何前置条件，这不亚于欺骗。到时候不仅不能使人买到房，只怕连租都未必能租住得起。因为，他们显然也不能证明，未来十年间城市房租就不会出现大增长。

房租变化的幅度虽不能与房价相比，但至少处于增长态势。这一点，凡当下正在城里租房之人，想必已是感同身受。特别在今年，很多人在房东的知会下，废止了原来一纸尚未履行到期的租赁协议，不得不因为一笔数额增加的租金而重新改签一份协议。

问题是跟着出来：有没有把握在让人们租房等待的过程中，房租不会以较大幅度继续提升？有没有把握让那些租房过生活的人不会因为房租的变化而提心吊胆，最后连房租都疲于应付？

上述种种，假使租房论者不能逐一给出明确而肯定的保证，我们又怎么能够相信他们的主张，并为之甘愿献身一试？若承认上述的种种不确定性因素是必然存在且不可回避的，房租、房价、房贷以及种种可预见负担有可能随时增加、而工资收入变化又不大，又有什么理由去相信，十年之后必定比十年之前要强？租房之后一定就能买到房子？

■芳草斜阳

## 货币的力量

◎丁聘聘  
经济学博士  
浙江财经学院金融学院副教授

在民国银行史上，张嘉璈是重要人物。他曾经留学东洋，归国后长期担任中国银行掌门人，之后还曾担任国民政府的铁道部长、交通部长及中央银行总裁。1949年后，他辗转到了澳大利亚、美国，从事金融教学和研究，在学界颇多建树。民国时期的银行家群星璀璨，各领风骚，但像张嘉璈这样，游刃于商界、政界和学界并有诸多建树者，却仍少见。晚年，他在美国以英文完成的巨著《通货膨胀的曲折线——1939至1950年中国的经验》，至今仍是国际上研究中国通货膨胀历史的权威著作。这当然与他早年进入日本庆应大学攻读货币银行学打下的深厚功底与日后长年从事银行管理密不可分。

作为民国诸多重大金融事件的亲历者，他的分析评判至今仍很有价值。比如金圆券的发行。1948年8月，张嘉璈作为总统顾问曾上庐山面见蒋介石，力陈金圆券之不可行。蒋却一意孤行，没过几天就选用新任财政部长王云五的方案实行币制改革。最后，果如张嘉璈所言：金圆券发行，过了三四个月，限价即被冲破，最终引发了恶性通货膨胀。货币经济完全失控，加剧了蒋家政权快速灭亡。

后来移居美国的张嘉璈在他的英文著作中有一段深刻感悟：“二战之后，有许多历史的力量对国民党政府的垮台起了作用，但最直接的并使所有其他原因都显得无足轻重的原因，毫无疑问就是通货膨胀”。这与美国历史学家韦慕庭的观点不谋而合：看来豪

无疑问，中国在战争期间和战后的通货膨胀，是导致国民党政府垮台、中国共产党统治大陆的主要原因之一。”如果这种观点你觉得是一种奇谈怪论，那么不妨再听听货币经济学家弗里德曼的观点。

他不止一次谈到类似的看法：国民党军队在战场上的失败、蒋家王朝的覆灭与恶性通货膨胀率在时间上吻合得如此之好，其实绝非偶然（参见弗里德曼《自由选择》、《货币的祸害》等著作）。

更有意思的是，弗里德曼不仅将国民党的垮台归于通货膨胀，而且认为这种祸害的源头恰恰可以追溯到当时支持蒋介石的美国政府。

1929年至1933年，世界资本主义经历了空前危机，美国新任总统罗斯福为了摆脱危机，实行新政，在南方矿工的压力下，实行新政，在南方矿工的压力下，实行新政，南方矿工的压力下，实行“白银收购计划”。美国政府一直声称这一计划对中国非常有益，事实上，这对中国来讲完全是一场灾难。正是凭借着之前的银本位制，中国很大程度上避免了前几年大萧条的恶劣影响。而美国实行白银收购计划，使得世界银价高涨，中国不但不能继续进口白银，国内存银反而潮水般外流，引发通货紧缩百业凋敝，民众对蒋介石的支持大为下降。更重要的是，这一政策使国民党政权完全败亡。

后来移居美国的张嘉璈在他的英文著作中有一段深刻感悟：“二战之后，有许多历史的力量对国民党政府的垮台起了作用，但最直接的并使所有其他原因都显得无足轻重的原因，毫无疑问就是通货膨胀”。这与美国历史学家韦慕庭的观点不谋而合：看来豪

100元法币可买到两头牛，1938年只能买到一头牛，1939年能买到一只猪，1941年只能买到面粉袋，1943年能买到一只鸡，到了1945年只能买到一个煤球。到了1948年8月，却连一粒大米都买不到了。法币已经处于崩溃边缘。

危难之际，蒋介石孤注一掷，决定采纳财政部长王云五的方案，于1948年8月进行币制改革，发行金圆券。王云五是出版界巨擘，一向与财政金融素少渊源，他怎么当起了国财政部长，外界颇多猜疑，对金圆券大多抱着半信半疑的态度。新币按一比三百万的比例兑换法币，并限期强制收兑民间金银及外币，对商品实行严格的限价销售，以期稳定物价和人心，使经济恢复正常。为此，蒋介石还特派蒋经国到上海亲自督导，严查不按“八·一九限价”销售奸商。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打虎运动”。然而正如张嘉璈预料，相对稳定的物价仅仅维持了两个多月，随着市场信心的瓦解和金圆券发行量的迅速扩大，物价犹如脱缰野马，一发不可收拾。从1948年8月到1949年4月，金圆券的发行量已达7600亿元，上海的物价指数八个月内上涨了200万倍。这时的物价不是几天一个涨风，而是一日数涨。广东一家造纸厂，竟买进800箱票面100至2000元的钞票，当作造纸原料。坊间流传着这样的民谣：“大街过三道，物价跳三跳。工资像雪团，搬会儿就化掉。”此时离国民党政权的全面败亡只有几个月。

逃到台湾的蒋介石曾经讲过这么一句话：国民党是自己打败了自己。他反思国民党的腐败，军队的内斗。也许至死没有想到，恰恰是他自己一手推出的币制改革最后一招把自己送进了坟墓。这，就是货币的力量。

■非常禅

## 听，钱在窃笑

◎陈孝荣  
作家，现居湖北

每当我们说出“钱真是个好东西呀”时，我们都开心地笑。是呀，钱真是个好东西，它能买来我们任何想买的东西。它可以使我们变得更加舒服。它也可以让我们变得更自信。自从进入中午之后，我的内心就进入了一种“恐慌时期”，上有老下有小，哪样都离得了钱呢？除了眼前的现实问题要解决之外，我们又拿什么来预防不可预测的灾难呢？这些问题都一个字：钱。如果有了足够的钱，我就没有这些恐慌了。我也就可以踏踏实实地写长篇巨著了，十年磨一剑了。哪位作家不想“耐住寂寞”，写一部自己想写的长篇头呢？一个真正的作家终其一生，大概都在向那一部书奋斗吧。可是问题是，这寂寞怎么耐得住呢？老人要养老，小孩要上学，一家人得生活。

我曾写过几部长篇，卖出去的价钱不好，剩下的没有找到买主，长篇的写作就只得被迫停下。而“适销对路”的作品我又写不了，言情、武打、玄幻等等，都不是我的长项。所谓“作家富豪榜”，永远与我无缘。我所熟悉的只是底层小人物的生活。那么就先来点“短、平、快”再说吧。这样，我就只能是不停地写作，心里想的就是稿子能卖个好价钱。当然如果单纯从挣钱的角度讲，我也可以选择另外的行当。但那又是我不愿意的。男怕错行，我年青的时代选择了写作这个行当。那时文学火着呢。哪知费劲地从其他行当跳到文学这个行当里来，文学一下子就边缘化了。现在改行是来不及了，左思右想，那就把写作当成生活，一步一步往前走吧。

现代性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物质的富有。今天的人们对钱嗤之以鼻，不是有病，就是他太有钱了。因而在我家乡，人们挂在嘴边的还是“见钱不抓不是行家”，“有钱的家好当”，“我是英雄财是胆”等等这样一些关于钱的俗语。钱的重要自不待言。

可问题是，今天的钱太重要了。翻开报纸，打开电视，看到最多的还是金钱又放倒了多少贪官。哪里又发生了抢劫案。哪里又出现了诈骗犯。哪些地方又因为利益发生了争执与械斗。多少人又因为钱打起了官司。多少亲人又因为利益对簿公堂。等等，等等。五花八门，不一而足。大千世界，因为一个“钱”字上演了一幕幕悲剧。这些活剧不管有多么复杂，多么新奇，多么离谱，但背后就一个字：“钱”。钱毁掉了我们的价值观，毁掉了人性中起码的善。人性中，欲望的膨胀，恶的膨胀，使钱异化成了一个魔鬼。我们似乎听到了钱躲在人们身后的窃笑声。它说：我真伟大呀，你看他们都拜倒在我的脚下，对我顶礼膜拜，我感觉多么爽啊！我比他们的亲爹还亲，比他们的亲娘还亲，我感觉多么牛啊！

可是，人又是多么奇怪的一个动物呢。我们听凭欲望的生长而不觉得脸红。想必钱的窃笑还会继续下去，由窃笑变成狞笑吧？

■彼岸

## 没有经济自由 独立便是空头支票

◎袁晓明  
管理咨询顾问，专栏作者  
现居美国达拉斯市

在1948年独立以前，英国殖民地缅甸是东南亚最富有的国家之一，但今天的缅甸却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而且在政治上经历着动乱。

在上世纪四十年代末，香港同样在英国殖民统治之下，那时候也不是一个富裕的地方，经济水平还比不上上海，可是今天的香港却是世界上经济最发达、最富有的地区之一。

印度也曾是英国的殖民地，更有意思的是，独立前的缅甸还是殖民地印度的一部分。今天的印度是经济正在崛起的国家，虽然仍然面临许多挑战，但印度已经注定是二十世纪世界舞台上最重要的竞争者之一。

缅甸、香港、印度当年同为英国殖民地，半个世纪后，三者却有不同的境地和前途，这里面有非常值得深思的地方。尤其是如果将时间推回到1997年以前，那就更具戏剧性，因为三者中最发达、最富有的香港承受着殖民的“耻辱”，享受独立荣耀的缅甸和印度却不得不承受经济和政治上的负担，尤其是缅甸作为国家当年获得了独立，但缅甸人作为个人却逐渐地失去了人权和自由。

解读缅甸、香港、印度的命运，容易读出，经济自由对财富创造的重要、政治民主对人权保证的必要。香港经济的发展有许多因素，但无可否认的是，香港拥有全球最自由的经济体制，印度是一个宗教众多、宗教情节浓厚的国家，但印度并没有像一些中东国家那样，要么成为一种宗教统治的专制国家，要么宗教和派别之间相互残杀，印度的政治民主以及政教分离给印度人一种聚合的力量，正帮助印度成为政治和经济大国，而缅甸在经济和政治上的专制给缅甸人在经济和政治都带去了极大的苦难，缅甸独立的先驱们满怀希望要把缅甸建设成一个福利国家，但却得到适得其反的结果。1962年上台的军政府对国家和人民施行专制，同时也把缅甸推到了世界最贫穷的国家行列。

从缅甸、香港、印度的历史、现状和将来，不难看出这样的趋势，人类的历史已经走到了经济自由和政治民主的阶段，顺应潮流者将走向国强民富之路，逆潮流者则是阻挡历史的车轮，缅甸就是这样一个逆历史潮流的例子，即便缅甸曾经有过那独立的荣耀，如今也并非如一些发达国家那样驻扎着外国的军队，当权者也喊出那些动人的口号，但缅甸人却缺少最基本的人权和自由，他们的创造性被扼杀了，不得不承受由此带来的贫困和苦难。

缅甸、香港、印度还给出了另一个层次的解读，即缅甸为自己获得独立的身份付出了极为沉重的代价，并将继续付出代价。国家独立是一个国家崇高的责任和目标，但那只是一个通向独立、自由之路的一个中间过程，因为只有当人的独立、自由被高高举起，那才是独立和自由的终极目标。那些独立的非洲国家（比如苏丹）多年被腐败的军人独裁者统治，国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可以说，对于那些被腐败独裁者统治的非洲国家来说，国家独立更多地给专制的政客带去了权力和好处，对于广大国民的政治和经济生活来说，国家独立带去的荣耀几乎就是一张空头支票。

